

《坎特伯雷故事·总引》骑士叙事的文学地理考论

石小军, 董赛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早在中世纪, 希格登和博韦等史学家就明确指出历史和地理是“人类事务”的时空两面, 二者集合为一体, 共同作用于整个社会。现代中外学者建立的文学地理研究框架和范式似乎即承袭于前人的这一社会认识论, 具体包括文本在历史、现实层面展现的空间语境和其所再生出的地理图像及意指。研究聚焦《坎特伯雷故事·总引》中的骑士形象, 一方面以中世纪相关历史文献为依托, 考察了“总引”骑士叙事所折射出的历史真实性和文学创作性; 另一方面又以中世纪“加泰罗尼亚地图册”为背景, 复原骑士挺近圣地的“向心”继而远赴东北欧的“离心”两段征战轨迹。研究表明, 骑士作战轨迹可以复原为一个四方环绕基督世界的圆形“十字架光环”, 似乎意指骑士追随基督以期获取救赎的精神世界, 这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乔叟文学创作之严谨匠心。

关键词: 文学地理; 中世纪史籍和地图; 乔叟; 《坎特伯雷故事·总引》; 骑士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5-0218-13

球王贝利、乐手保罗·麦卡特尼、企业家比尔·盖茨、赛车手刘易斯·汉密尔顿以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大卫·麦克米伦等各界名流均先后被英国皇室授予骑士之殊荣。很显然欧洲古谚所描绘的“忠诚慷慨、驰骋四方、必有武艺”这一针对骑士的特定内涵, 在当今已扩展覆盖至全世界各领域精英, 乃至成为一种荣誉。其本来战争范畴在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演变中渐已弱化湮灭, 但骑士精神所弘扬的“理想、美德和观念却深深刻印在欧洲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诸多方面”, 并“日益凝冻为欧洲文明的精神核心和文化遗产”^{[1][212]}。

纵览历史, 史学界一般将八世纪封建采邑制度视为西欧骑士的发端; 在十一、十二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 骑士制度和文化在基督教精神和欧洲条顿人尚武传统的相互影响与结合中逐步得以形成; 自此, 历史上开始涌现出诸如狮心理查、威廉·华莱士和亨利·珀西等大量真实骑士, 文学上也广为流罗兰、亚瑟王和奥兰多等一批完美体现骑士精神和美德的经典形象, 乔叟笔下《坎特伯雷故事·总引》中的骑士即为一例。本研究从骑士征战天涯捍卫荣誉的传统形象切入, 意图从现代文学地理角度揭示这一人物形象之经典性或许源于诗人独到的“历史意识”(historically minded)和“精确的历史纪事”^{[2][305]}; 再从历史走进文学, 进一步展现出欧洲骑士之悠久传统和至上荣誉。其不仅影响了欧洲中世纪中后期社会生活和民众思想的精神道德价值观, 而且在现代西方社会和文学世界中仍具影响力。

一、文学地理学经纬及相关乔叟研究

“文学地理”(Literary Geography)这一概念最早由苏格兰小说家夏普(William Sharp)于1904年在

收稿日期: 2023-10-19; 修回日期: 2024-09-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古英语诗歌与地图史籍研究”(23BWW032)

作者简介: 石小军, 男, 上海人, 文学博士,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世纪英国文学文献研究、乔叟研究、中古英语句法研究、版本目录学研究, 联系邮箱: shoguns@uibe.edu.cn; 董赛, 男, 河南周口人,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 乔叟研究、中世纪英国文学文献研究

其同名专著中提出^[3];次年,本杰明(Lewis Benjamin)和基顿(Frederic Kitton)分别出版了《萨克雷的乡村》和《狄更斯的乡村》两部人物传记,各自描述了两位举世文豪曾经真实生活过和文学加工过的两类地理空间,探讨了真实空间对想象空间所产生的影响;现代主义作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随即也借用夏普的这一视角指出,上述“作家的两类地理空间应一并被归为‘文学地理’,但也许想象加工过的后一类情境会更令读者神往”^{[4](161)}。即使一个多世纪后的2015年,学者亚历山大(Neal Alexander)也依然认为“哈代(Thomas Hardy)基于历史所构建的威塞克斯这一文学桃源更具魅力。”

回归理论,法国学者韦斯特法尔在1999年提出的“地理批评”(Géocritique)就已进一步丰富和夯实了文学地理研究的内涵。他首先以美国学者苏贾(Edward W. Soja)所强调的后现代空间为基础,提出时空之不可分割性、文本于现实之指涉性,以及真实空间和想象空间之交错越界性等三点,并由此推断文学中的地理描写具有可再生性,且易成为一种作用于外部世界的新动力;受启发于韦氏的“地理批评”理论,2012年,美国学者塔利(Robert Tally)又细化提出了“文学绘图”(Literary Cartography)的概念。他认为由于文学描写不仅能够呈现叙事主体与更宏大时空背景间的关系,还能够表征指涉广阔的社会空间,且又建构出由虚构与真实相融而成的“第三空间”^①,因而其具有一种类似地图绘制的功能——通过文学地理叙事来“赋予世界(多重)形象,帮助(读者)认识世界”^{[5](60)};塔利随后又将此“文学绘图”理念运用至文学地理批评实践,详细探讨了多种文类的叙事时空模式。比如,他具体以《霍比特人》为例,指出此类冒险叙事多涵盖有“固定的情节模式、概览式地图和行程轨迹,并具有特定的认识价值论以及意识形态性”^{[5](61)}。

更多相关文学地理研究表明,此类研究尤为强调空间/地理和时间/历史的不可分割性,正如韦斯特法尔之言:“空间生成是一个时间累积过程,场所只有在时空关系中才能被感知。”^{[6](26)}而事实上,文学地理学科也正是从学者们对长期在西方人文思潮中占统治地位的“时空二元对立思维”的质疑中而发端,因而其也是“空间转向”运动的组成部分^{[7](190)}。至此,经过学者们一个世纪以来的努力,文学地理学这一学科的研究内容和范式已基本确立,具体包括作家实际所处所知的地域地理空间和对其创作之影响,以及作品由前者而建构出的想象地理空间乃至意义。我国学者杨义对这一内容范式亦有异曲同工式阐释:“空间维度包括地域、家族等维度的介入,使我们对政治文化、诗文品格的体验变得丰厚活泼,使它们从字里行间走到青山绿野,同我们在天地悠悠之间进行情绪交流、思想对话。”^{8}

基于此,近年来更为具象的“文学地图”,即上文塔利所述文本蕴含的“概览式地图和行程轨迹”,逐渐发展成为解读文学地理内涵的一个重要研究工具。这一领域的重要开拓者莫莱蒂(Franco Moretti)在《欧洲小说地图集》一书中就曾绘制过简·奥斯丁时期的英国区域地图和左拉时期的巴黎地图。他秉持“我们应该跨越地图是文学作品的装饰与解说的观念,把地图当作一种不同寻常方式的文本解析工具,以此揭示作品中更为含蓄隐蔽的信息”^{[9](7)}。2017年,梅新林和葛永海甚而将“文学地图”冠以“文学地理学的第二语言”之称^{[10](20)}。

似乎受益于文学地理研究的发展壮大,中古英语文学学界也逐渐开始关注文本诗行中的史地时空。基于文本在史地社会和文化层面的空间叙事所生出的图像与意指这两类文学地理研究框架,学者们由此展开了相关实践,由点到面,循序渐进。就图像研究而言,1956年,赫兹(John Hertz)就已统计出《坎特伯雷故事》中所现的五百余处地名^{[11](13)},考据了对乔叟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可波罗游记》和《曼德维尔游记》等地理作品和相关博物志;1961年,马古恩(Francis Magoun)编著的《乔叟地名词典》按照区域、时代归类考证了乔叟作品中大不列颠内外的地名,古代和中世纪地名,以及典故圣经地名^[12];2002年,韦斯特雷姆(Scott Westrem)寻找到英国中世纪“兰贝斯地图”(Lambeth Map)所现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地名,以及十四世纪“高夫地图”同坎特伯雷朝圣路线之间的对点关

系^{[13](206-207, 209-211)}。意指研究,则在新世纪才开始呈现增多趋向。2006年,拉维佐(Kathy Lavezzo)结合中世纪地图固有的政治属性和宗教象征意义研究了《律师的故事》中英格蘭的地理边缘性及其对国家身份认知的影响^{[14](112)};2013年,高万川(Wan-Chuan Kao)从中世纪常见的“身体地图”之喻切入,解读了乔叟在《公爵夫人之书》中通过一一罗列“白衣女子”所到之处,营造出中世纪“列单地图”般的直视感,令“黑衣男子”不禁睹物思人,同时进一步阐释了乔叟借诗歌中地名所影射出的骑士为获取贵妇之爱而去异域他乡冒险的宫廷爱情传统,展现出一种法国宫廷式的高贵^{[15](354-356)};2018年,比尔(Jane Beal)探讨了乔叟在《致罗斯蒙德》赞美诗中将“美丽妇人”比喻为“世界地图”所衍生出的多重象征意义^{[16](110)}。

相比较于上述研究中的乔诗人物,《坎特伯雷故事·总引》中的骑士,乔叟对其的叙事所体现出的文学地理要素要更显直观丰富。在该作三十余行诗句中,乔叟用十三处地名勾勒出骑士的戎马一生。这些地点均真实记录于中世纪史籍和地图中,分布在基督世界同异教区域接壤的边缘地带,其内涵比较深远。乔学专家也多已意识到该诗中骑士形象的这一研究价值。他们多尝试从历史地理角度探究骑士形象的善恶等深层意义。比如,以普拉特(John H. Pratt)为代表的学者通过考证骑士征战的地域和社会影响,结合乔叟本人的宫廷背景阅历而推断诗人笔下的勇士是一个“不忘东征誓言”、常年在边疆与“异教徒”英勇作战,并且“屡屡得胜”最终赢得“荣耀”的豪侠^{[17](21)}。与之相反的是,琼斯(Terry Jones)则以骑士先后在北非和土耳其等地加入异教徒间纷争、又北上东北欧介入基督徒间的同类残杀等为证据,论定骑士实系一名为金钱利益而强取豪夺的雇佣军,故其形象远非光辉^{[18](100, 114)}。故此,从文学地理研究出发,涉猎“总引”骑士这一形象,仍有较大的空间,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

前人学者多从微观区域性地理视角切入,结合当时英格兰政治经济发展史来展开对骑士的文学批评。本文则依据中世纪英格兰、西班牙和意大利多国的东征史籍及相关编年史等文献,在宏观上全面审视骑士的史地轨迹和空间叙事;同时鉴于“文学地图”这一新兴文学地理研究工具的互文具象性,以T-O地图[®]和“加泰罗尼亚地图册”等欧洲中世纪宏大的世界地图为参照,于中复原骑士以始为终、环绕基督世界的圆形闭环踪迹,以此尝试解读骑士牺牲自我、以获救赎的精神世界。

二、空间叙事——骑士的史地溯源和文化语境

首先,如前所述,文学地理研究立足于文本在史地社会与文化层面的空间语境,且直面文本时空背景、文本于历史现实之指涉性,以及虚构和真实间的交织性,其研究主体可追溯至中世纪。希格登(Ranulf Higden)和博韦(Vincent de Beauvais)等史学家曾明确指出历史和地理是“人类事务”的时空两面,二者集合为一体,共同作用于整个社会。“英诗之父”笔下的十四世纪英格兰百态社会自然也包括了丰富的“人类事务”。

相关研究表明,相比较于同期其他作家,乔叟更具“历史意识”,并在中后期作品中愈加关注“精确的历史纪事”。“总引”骑士即为明显例证。他在近半个世纪的戎马生涯中曾参加过欧非亚三大洲的“十五次鏖战”(GP 61),西至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Algezir, GP 57,今Algeciras),南到北非“特莱姆森”(Tramysene, GP 62,今Tlemcen),东及“土耳其”(Turkye, GP 66),北上“俄罗斯”(Ruce, GP 54),“行迹比谁都辽远,不论是在基督教国家境内或在异教区域”(GP 48—49)[®]。此处文学记述均可在同期历史文献中寻得证据和参照。

(一) 文本于历史现实之指涉性

按史料推算,骑士参加的攻克“格拉纳达”(Gernade, GP 56)的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之战

应发生于1343年,历史上归属为“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再征服’”(Reconquista)运动的重要一环;史实表明此役在卡斯蒂利亚王国阿方索十一世(1325—1350年在位)的带领下取得阶段性胜利。纵观全局,“再征服”运动始于八世纪,在第一次东征(1096年—1099年)开始后,以打通“西班牙通道”、横跨地中海,进而直抵圣城耶路撒冷为长期重要目标^④。然而,这一超长战线却在此后不同历史时期又被迥异规划。1305年,哲学家拉蒙·柳利(Ramon Lull)的五条线路方案影响尤为深远。他在给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二世的《末日之书》(*Liber De fine*)中曾明确设计其一的“西班牙通道”——由西班牙经休达、突尼斯和埃及而终抵圣地^{[19](176-216)}。乔叟笔下骑士的征战轨迹似乎与之相吻合:“总引”中,骑士除阿尔赫西拉斯之战外,还曾一路南征摩洛哥与特莱姆森(GP 57, 62),直指史实。学者琼斯认为后两场北非战役实属阿拉伯王国间的异教徒纷争,因为在十三、十四世纪,北非伊斯兰地区有雇佣欧洲基督骑士助阵部落冲突的传统,他由此判断乔叟诗中的骑士很可能就是为金钱而战的雇佣兵^{[18](100, 114)}。

然而,史料表明,1309年,柳利又在《圣地收复之书》(*Liber de acquisitione Terra Sanctae*)中进一步细化了上述“西班牙通道”中的北非部分:他建议东征军应该以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的休达港为枢纽,向东继续攻取摩洛哥、突尼斯和埃及等地;最后再抵达圣地^{[20](545)}。阿方索十一世对此提议也积极响应^{[21](213)}。再横观该战线,本研究首先定位北非西北角的休达,发现收复直布罗陀海峡北岸的“阿尔赫西拉斯”之战似乎确系开辟这一超长阵线的第一步。因而此役过后,骑士又继续深入北非的摩洛哥和特莱姆森(突尼斯)之举很可能就系按照柳利提议、为收复东方圣地所做的第二步准备,而非琼斯所言为金钱而战。此推论一定程度上也同“总引”骑士“在特莱姆森为我们的信仰而战”的描写相一致(GP 62—63)。然而,再据《直布罗陀东征——卡斯蒂利亚与海峡之战》一书记载,1350年,阿方索十一世暴毙于瘟疫,西班牙反攻北非的长久计策就此搁浅,可以预见骑士随即也不得不中止此次北非之行^{[21](189)}。

结合实际地理位置、东征史料以及艾德伯瑞(Peter W. Edbury)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又整理总结出骑士北非抽身后的具体轨迹。骑士顺势沿地中海南岸东渡,出征土耳其“阿达里亚城”一役(satalye, GP 58, 今名 Antalya),“亚历山大里亚被攻破占领时,他也在场”(Alisaundre, GP 51),还鏖战于叙利亚“列亚斯”海域(lyeys, GP 58, 今名 Ayash)。历史上1361年、1365年和1367年,在此三域也的确相继发生过战争,至此,乔叟的文学创作似乎又再次指涉史实^⑤。据史料考证,此三场战争均由塞浦路斯国王彼得一世(1358—1369年在位)指挥,虽因基督教各政权间矛盾重重,加之彼时埃及土耳其一带“异教势力”过于强大等内忧外患,最终均以败退收场,未能收复耶路撒冷;但相较于常居陆地的异教穆斯林军队,岛国塞浦路斯的东征军更擅长海战,因而此间也偶有胜仗^⑥,这或恰好又可成为“在地中海东岸凯旋的大军中也有他一个”(grete see, GP 59—60)这一文学描述的历史注脚^⑦。其中,第二场1365年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突袭的相关史料记录尤其详尽,可能同亚历山大里亚在基督世界中的圣城门户之定位有关。因为追根溯源,由埃及进入圣地始终是柳利和威尼斯政治家萨努多等人热衷的梦想。并且据彼得一世辅政大臣济耶斯(Philippe de Mézières, 1327—1405年)的亲笔证言,此次亚历山大里亚之攻城战也正是其君主为最终收复圣地所做的先期布局^⑧;此外,1361年和1367年另外两场战争的发起依据,似乎也能从前述柳利1305年所规划的五条收复圣地系列线路中略知一二:二者先后定位于“小亚细亚—叙利亚—直抵圣地”一线中的阿达里亚城和列亚斯两港口要塞,此处开战,应非历史之偶然,骑士的这两场出征(GP 58)也好像并非诗人信手之笔^{[19](176-216)}。然而,目前本研究尚未发现骑士在“土耳其”“帕拉希亚”(Palatye, GP 64—67, 今名 Balat)所参加的“异教徒”间战争的相关历史线索。由于骑士似乎不太可能会专程从英格兰千里迢迢来此介入异族间纷争,且该域又同以上阿达里亚城、亚历山大里亚和列亚斯三处毗邻,故大抵可推测骑士很有可能是在三场战争间隙顺道参加了帕拉希亚某些异族部落间的冲突^⑨,被历史略过也不算意外。

十四世纪六十年代,地中海东岸沿线区域的东征总体出师不利。但此消彼涨,史料表明,条顿骑

士团(Teutonic Order)于1283年发起的立陶宛异教区东征却在此时进入一个高潮^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骑士为继续守卫基督世界,又北上“立陶宛与俄罗斯”(Lettow, Ruce),“与他同级的基督徒都比不上他所征战的次数多”等文学桥段似乎也顺理成章(GP 52—55)^⑦。历史上,立陶宛东征一直延续至1410年,其间,欧洲贵族与骑士们亦踊跃加入以寻求新的东征疆场,英格兰骑士尤为活跃。比如1390年,德比伯爵博林布鲁克(Henry Bolingbroke, 1366—1413年)就曾率三百众人参加了著名的维尔纽斯战役,并由其随行财务官详细记录在册^[22]。而在乔叟写于1388至1392年间的“总引”中^⑧,骑士恰好“刚出征归来,随即参加了朝圣行列”(GP 77—78)。这一文学创作与历史事件的时空一致性表明,诗行间骑士的“出征归来”似乎意在指涉德比伯爵的维尔纽斯东征。

(二) 文本于历史真实之交织性

相比立陶宛东征,同期“俄罗斯战事”却似乎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乔叟研究专家厄本(William Urban)和普拉特对“Ruce”(GP 54)的地名起源进行了考证。一方面,厄本根据十四世纪英格兰与俄罗斯并无交集这一历史,推断骑士所至的“Ruce”可能仅系立陶宛北方地区“萨莫吉提亚”(Samogitia)的“罗斯尼亚”(Rossenia)一带。究其原因,厄本认为,首先因“罗斯尼亚”地处条顿骑士团国(State of the Teutonic Order)中利沃尼亚(Livonia)和普鲁士一北一南两个归属地之间的要塞位置,为打通两地,十四世纪后期骑士团在此的异族之战尤为频发;其次,由于“Rossenia”与“Ruce”(俄罗斯)在发音上相近,加之当时的确有很多俄罗斯人在此为立陶宛军队打仗,也都有可能使归乡的英格兰战士将“Rossenia”就误传回为“Ruce”^{[23](349—350)}。另一方面,普拉特则发现“Ruce”一词在十二世纪初的古斯拉夫编年史《往年纪事》(Primary Chronicle)中专指俄罗斯“大诺夫哥罗德城(Novgorod)及周边区域”,实非俄罗斯整体。尽管两位学者在“Ruce”一词所指国家上有分歧,但都又认为此处战事的规模仅局限于东北欧的某一小片区域^{[17](13)}。

然而针对“Ruce”的历史起源,本研究从制作于十二、十三世纪的多幅世界地图中似乎又能寻得一些新的线索。例如,其一,制作于德国北部的大型世界地图“埃布斯托夫地图”(Ebstorf map, 十三世纪)对俄罗斯的描绘就较为具象:先是在该图左方的俄罗斯北部外侧,标注有较为醒目的“里加城市”(Riga civitas)字样,这一基督条顿骑士团的东征据点在图中由五座集中排列、颜色鲜艳的城堡图案所表征^⑨;同一时空,位于欧洲左上方的俄罗斯边缘则绘有四座城堡,两两一排、分别顶立于域内上下两边,且颜色均相对偏暗,体型巨大的两头麋鹿和野牛占据城堡间大片空白区域,而俄罗斯东南部边缘又写有“斯拉夫野蛮人部落”(slavische babarenvölker)字样。其二,同“埃布斯托夫地图”风格和知名度均接近的十三世纪末英国“赫里福德地图”(Hereford Map)中,俄罗斯所在区域内则有一硕大北极熊,并配以“这里是俄罗斯”之字迹。其三,在发现于英国约克郡的“索利地图”(Sawley Map, 十二世纪末)中,俄罗斯区域又隔海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Noreya)相望,其间居住有被高山所围困的“狗头人”(Cynocephales)。其四,在伦敦的“诗篇集世界地图”(Psalter World Map, 1225年)中,俄罗斯域内又写有“Irii Scite”一词。据学者米勒(Konrad Miller)在十九世纪末考证,该词可指同域内的异教徒“斯基提亚人”^{[24](141)}。在以上四幅尺寸由大渐小的地图中,俄罗斯较为一致的表征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它在基督信徒理念中辽阔偏远且野蛮的异教属性^⑩。加之从乔叟在上述《致罗斯蒙德》一诗中就明确论及过“世界地图”的百科性质这一依据出发,本研究又进一步推断:不论是从诗人被公认的知识渊博性而言,还是从其外交使臣和海关官员的职业身份判断,乔叟也应都对上述地理人文信息有一定知晓,进而促使其能够在“总引”骑士的字里行间针对俄罗斯全域疆场而尽情展开一场文学想象和创作。在此,文本虚构和历史真实交织相融,而非一定如厄本和普拉特所认为的局限于历史上某一区域的战事再现。所以,骑士足迹遍及“异教区域”(hethenesse, GP 49),“屡屡鏖战”(GP 55),彰显其征战疆域之广、经历之丰。

在诗人笔下,骑士总共参加了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北非一线、地中海东岸以及东北欧等四个异

教区的一系列战役,同当时基督宿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厮杀。史料记载,这一时期的东征多由上述阿方索十一世、彼得一世和博林布鲁克(即后来的亨利四世)等历史上的传奇君主所指挥率领,构成了十四世纪基督徒东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史上东征多以失败告终,但乔叟笔下的骑士却在生涯十五次决战(GP 61)中频繁获胜,“为君主作战,十分英勇”(GP 47),“在特莱姆森竞技场上……为维护基督信仰而战过三次,且三次都战死了敌人”(GP 62—63),在土耳其“没有一次不争得盛名”(GP 66—67);“在普鲁士多次高居庆功宴首席”(Pruce, GP 52—53),风光一方。

总之,乔叟对骑士英勇善战、“始终酷爱武士精神,以忠实为上,推崇正义”(GP 45—46)的评价也正是对他不惜九死一生来守护基督的一种赞誉,同时也反映出诗人本人的信仰倾向。史料证明,爱德华三世也极为推崇骑士精神,在其半个世纪的当政期间(1327—1377年),他曾多次举办骑士比武大会,并指挥将士大胜法国、西班牙和苏格兰等国军队,期间他于1348年创立的英国“嘉德勋位制”(Order of Garter),被视为英伦骑士之最高荣耀,延续至今。有趣的是,爱德华三世本人还多次任命乔叟为宫廷官吏、并为其封赏^⑩。乔叟也曾在1359年跟随爱德华三世长子、有“骑士典范”之誉的“黑王子”伍德斯塔克的爱德华(Edward of Woodstock)前往法国参加过“百年战争”。因此,“总引”骑士的光辉形象很大程度上同诗人所亲身经历的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有关;然而同时需要强调的是,诗歌创作毕竟与史书书写不同,前者本质带有虚构性,后者则更倾力于记录事实,所以读者往往也不会十分关注乔叟诗歌描写的真实性。显著一例,诗人笔下骑士的征战顺序就同东征各战事的实际历史先后有较大出入。究其因,乔叟本人似乎也借僧士之口在“僧士的故事开场语”中加以说明,“首先我要请你们饶恕我所知有限,如果我没有按照书上所列的时代次序而讲,不管是教皇,或是帝王,有些提前,有些挪后,我只能记起哪一个就先讲哪一个”(M&P 1984—1989)。此外,诗人应该也有出于押韵对仗和诵读流畅之因素而特意为之。

三、空间想象——骑士东征的图像和意指

以上述文本在史地社会与文化层面的空间叙事为基础,下文将转至骑士空间叙事所再生绘制出的想象地理空间(“文学地理学的第二语言”)及其建构意义。为进一步解读骑士和乔叟的精神世界,本节以象征性著称的T-O地图、中世纪德国写本插画和科学性明显的“加泰罗尼亚地图册”等为依托,尝试重点考察骑士的征战轨迹是否能够意指和印证学者哈雷(John Brian Harley)的论断——地图因其“语言性、图像性和知识性”所产生的“象征意义和权力意志”^{[25](53-54)},也即上文塔利所述的冒险绘图蕴含的“特定的认识价值论以及意识形态”。本研究在乔叟的诗行间发现,骑士为收复圣城挺进圣地中心和征服异教徒奔赴异域边缘的先后行程,可分别构成“向心”和“离心”之图像,进而合成一个“十字架光环”。此处的这一“文学地理学的第二语言”似乎一定程度意指骑士出生入死为基督救赎和乔叟为其而歌的“认识价值论以及意识形态”。

(一)“向心”图像和意指

由T-O地图可见,骑士为收复圣城一路向东,跨越地中海,直奔圣地“中心”。诗人笔下的这一“向心轨迹”或可从历史和宗教的角度寻得缘由,同时也通过地图显示出深层含义。首先,在历史上收复圣城耶路撒冷始终是东征的神圣使命之一。这一使命很可能同耶路撒冷悠久的基督教历史有关: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占耶路撒冷;四世纪,罗马帝国改信基督教,重建该城后奉之为圣城;公元637年到第一次东征时期(1096—1099年),圣城陷于伊斯兰教徒的统治。自特罗马帝国继承人的中世纪基督政权视收回耶路撒冷为己任,就此,收复圣城被定义为基督徒的使命和正义之战。

其次,在《圣经》中耶路撒冷系耶稣受难埋葬之地(《路加福音》23:33, 53),也是基督第二次降

临主持末日审判之所(《使徒行传》1:9—12),所以收复圣城的东征又再添保卫“圣墓”之意。而实际上,教皇所颁教令对此也确有描述:1165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为东征颁布的“教令”(papal bull)《吾等之前辈》(*Quantum praedecessores*)中悲叹,耶路撒冷如若落入敌人之手将会使“基督圣墓”和其他圣物遭受亵渎与毁坏;1181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教令”《吾辈之心》(*Cor nostrum*)中倡议所有信徒为守卫圣城而战,以证明“基督在此为我们所流之鲜血未有遗忘”^{[26](207), [27](76)}。此外,再由《圣经·启示录》而知:基督在末日来临之时化身为白马骑士,头戴“冠冕”、口含“利剑”,在耶路撒冷同敌基督展开决战(《启示录》19:11—16)^⑥。或许因此渊源,中世纪日耳曼文学作品也多将基督描绘为完美骑士以供众人效仿。乔叟笔下的骑士自然也不例外,其“效仿基督”(GP 45),既“正义忠诚”“骁勇善战”,又如“少女般温顺”,“一生从不恶言”(GP 46, 47, 69, 70)。如此“完美温良的骑士”(GP 72)以收复圣地保卫圣墓为使命,倾其一生投身东征同异教徒战斗,并笃信自身将终有望能够在末日审判中获得上帝接纳与救赎。

同时,骑士的这一夙愿仿佛也体现于 T-O 地图耶路撒冷区域的图文叙事之中,这也再次印证上述“文学地图”这一“文学地理学第二语言”所具有的互文具象性。T-O 地图中,耶路撒冷一般位于画布中心,同其在《以西结书》中的“世界之脐之称”(5:5)相一致。比如在“埃布斯托夫地图”中,正中心的耶路撒冷是一个由十二座城门和黄金城墙组成的天国之城,城内,耶稣从圣墓起身准备再次降临尘世,对应于《启示录》天国耶路撒冷的相关书写(21:10—13)。此景在稍晚的“赫里福德地图”中则布画得更为具体直接:耶路撒冷在图正中心,呈圆形城垛状,且被醒目放大;城垛正上方为“骷髅地”(Calvary),受难的耶稣被钉于此处十字架上;由此再向上越过地图圆形边框、升入天国耶路撒冷,“宝座上的基督”正主持末日审判,天使与祥云环绕其间;基督右边被救赎者正由天使引导升往天堂,左边被惩罚者则在煞神驱使下坠至地狱,且一右一左分别标注有“起身吧!去往永恒之欢乐”和“起身吧!去受地狱之煎熬”之拉丁文字样^⑦。

两幅著名的 T-O 地图于中心处逼真再现《圣经》相关书写,加之乔叟关于骑士横跨地中海沿线、征战十座城池、一路奔赴“圣地中心”的细致描写(GP 58, 66),或许均在进一步意指耶路撒冷兼具末日审判地和天国通道之功能。它不仅是世界中心和耶稣受难地,也还预示着末日审判和天国启示,传递了基督教以救赎为核心的价值观。由于此种 T-O 绘图愿景与东征起因高度一致,因此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地图承载了皇室教会作为地图赞助人和东征发起者对收回圣城、保卫圣墓以及迎接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希冀;另一方面,它也蕴含有以“总引”骑士为代表的东征将士对获取末日救赎的期待。或许在基督世界看来,乔叟笔下的骑士就如同“赫里福德地图”中的被救赎者,也是在俗世耶路撒冷经基督审判并在天使指引下前往天国的得救之人。诗人这一留笔显然与同时期 T-O 地图所描绘的基督教义一脉相承,也深深植根于数百年东征史中。

(二)“离心”图像和意指

收复圣城未果的骑士又绕过“中心”,一路北进,前往位于 T-O 地图左侧居世界“边缘”的“立陶宛俄罗斯”一带(GP 54),继续东征。乔诗中这一“离心轨迹”似乎折射出东征使命的转变——由收复圣地中心改至征服边疆异教徒。诗人此处一转笔锋,或可从同期条顿骑士团祭司与修士所作的编年史和《圣经》翻译解读等修会文学(*Deutschordensliteratur*)艺术作品中寻得依据和支持^⑧。如上文推论,骑士赶赴世界“边缘”的参战时间为 1390 年前后,而据史料记载,这一时期在此的战事仅有条顿骑士团所主导的百年“东北欧东征”中的部分战役,基于时间地理因素,本研究推断,“总引”骑士的此域活动很大可能归于以上战事。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最初 1190 年,条顿骑士团在“世界中心”成立“耶路撒冷王国”,意在用武力对抗基督之敌、守卫圣地并为东征战士提供医疗救助;1291 年,圣地陷落;1309 年,骑士团只好整体迁至欧洲北部边境的普鲁士玛丽安堡,并完全投身于东北欧东征。骑士所属条顿骑士团的使命随即相应转变为征服边疆异教徒,进而再使其皈依这一“大使命”(Great

Commission), 以迎接基督第二次降临^⑨。由此看来, “离心轨迹”与“向心轨迹”在精神追求上实属殊途同归。

首先, 细观东征军征服边疆异教徒这一“离心轨迹”之深层背景: 早在十三世纪末, 条顿骑士团成员平信徒赫斯勒(Heinrich von Hesler)在新约《尼哥德慕福音》和《启示录》的德语翻译和阐释中, 就特别以条顿骑士团为例, 赞扬其直面异教徒时的正义神圣, 且完美实现了善斥恶、光驱暗之基督教义; 1326年, 骑士团祭司杜伊斯堡的彼得(Peter of Dusburg)在《普鲁士编年史》(*Chronicon terrae Prussiae*)中, 同样也结合《圣经》对骑士团的骁勇做出解读。这一修会文学的代表作品在正题中不仅记录了十三世纪东征军征服当时还是异教区的普鲁士之过程, 还进一步就其战事渊源, 详尽追溯至旧约《创世记》中亚伯拉罕营救罗得的故事, 并就此评论“上帝忠仆与异教徒之战业已开始”; 同时, 彼得又详述了稍后十四世纪条顿骑士团在东北欧异教区的一系列军事行动, 以之类比于《马加比书》中马加比自异教徒手中赢回圣城之战役, 并从后者圣城争夺战所彰显的传统中寻找前者东北欧战事的合法性^{[28](33,44-48)}。

其次, 本研究再结合赫斯勒在其德语《启示录》写本中的三幅插画, 基于其具象互文性, 进一步解读前文所述的条顿骑士团如何征服异教势力, 致其皈依或毁灭, 并以此迎接基督第二次降临, 终成基督“大使命”之过程。在现存该写本的 Rps 44/III 168r 单面,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率领手持黑鹰旗的条顿骑士, 方寸间同在末日涌现的反基督部族“歌革和玛格”(gog and magog)正展开搏杀; 其后 Rps 64/III 137v—138r 的一篇两面则分别展示了异教徒被征服、接受洗礼, 以及忏悔皈依的场景; 最后在 Rps 44/III 175v—176r 的一篇两面, 圣母玛利亚于圣子降临之时荣冠加冕, 骑士们也在天使引领下追随其所尊崇的圣母、升入天国耶路撒冷, 而未能皈依的异教徒则被打入地狱遭受苦难^⑩。由此三幅循序渐进的插画可见, 此时在世界边缘, 圣母取代圣子, 成就了条顿骑士团此前“向心”东征时寻而不得的救赎——前往天国, 获得永生。

此外有趣的是, 关于上述第二幅插画中的东北欧异教徒“哥革与玛格”, 其败战后的皈依还可从同期世界地图中寻得丝缕痕迹。在中世纪 T-O 世界地图里, “哥革与玛格”一般位于图左侧世界北部边缘, 且在《圣经》和古罗马历史地理作品中多被意指为“末日”和“异族”。比如, 《以西结书》记录了“哥革”居住于“北方极远处”, 他们将在末日来临之际自此前去攻击圣地(38:15—16); 约翰《启示录》也记载了处于大地“四方”的“哥革与玛格”将在撒旦再次崛起之日跟随他摧毁世界(20:7—8); 古罗马时期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斯(Titus Flavius Josephus, 37—100年)在《犹太人战争史》中也曾提到为阻止“怪物哥革与玛格”危害文明世界, 亚历山大大帝用铁门将其封死在“里海北岸”的山口中(7:4)^[29]。切玛诺娃(Pavlna Cermanová)等现代学者认为第一次东征开始后, 基督战士在一路同异文化的接触和冲突中对“哥革与玛格”的认知日益扩大丰富, 并逐步将“斯基提亚人(Scythians)、撒拉逊人、土耳其人、蒙古人、狗头人(Cynocephales)以及亚马逊女战士(Amazons)等异教徒”都一并纳入其中^{[30](239-240)}。“哥革与玛格”在中世纪后期更是逐渐演变为基督教敌对势力的代表, 并作为“末日符号”居于荒蛮北方。而常现于 T-O 世界地图北方的野兽怪物图像也似乎巧妙指证了此处的东北欧, 就是异教徒“哥革与玛格”的居住地。比如, 在上述文字性较强的“索利地图”中, 除最左侧波罗的海海岸的立陶宛俄罗斯地区写有“狗头人”字样外, 俄罗斯内陆广阔区域里又标有“鹰首狮身怪”(Hic habitat Griffes)字迹, 再往东面与其接壤的阿尔巴尼亚(Albania)一带则注有“食人族”(anthropophagi)字形; 又比如, 前述图画性突出的“赫里福德地图”中, 图左侧是位于最北方的立陶宛俄罗斯一带, 其里又有将外族人当作祭祀品的“塔乌里人”(Scitotauri)、“格里斯特人”(Gryphae)、“狗头人”及“斯基提亚人”, 字图并举^⑪。此类源自《圣经》和古典传说的怪物猛兽仍然是居于地图顶端“王座基督”的审判对象, 自然也是需要皈依基督教的族群。这或许恰好可同以上赫斯勒版的第一幅插画 Rps 44/III 168r 形成一种呼应, 揭示出插图中基督使者条顿骑士团打响北

方战事之因,而第二幅的 Rps 64/III 137v—138r 两面插画所描画的战败方“哥革与玛格”接受施洗和忏悔之景,则更是清晰寓意了东征使命之达成。很显然,中世纪世界地图里广阔的北方天地蕴含了“总引”骑士所搏杀过的“离心”东征之本来意图,同时也明确意指了“离心”东征在基督教文化中的道德合理性和宗教正义性。

与之同时,赫斯勒版第三幅插画的 Rps 44/III 175v—176r 两面“圣母加冕图”同样也能在“赫里福德地图”中找到照应之处。在 T-O 地图圆形轮廓顶端,圣母玛利亚跪于“王座基督”之下,其右后方修女高托冠冕,左侧天使则指向一段盎格鲁诺曼语文字,“我儿……如你所允诺,怜悯那些服侍我的人吧,让他们因我而获得救赎”^②;与圣母处于同一圈层,“MORS”(拉丁语“死亡”之意)的四个字母周正地分布于圆圈外上下左右四方。本研究认为,此种构图不仅突出了圣母圣子的亲密无间以及前者在末日审判中所起到的中保作用,还一定程度上中和了中世纪信徒挥之不去的死亡和末日危机感,这又与条顿骑士团希望通过圣母获取救赎的意图不期而遇。简言之,一方面,中世纪 T-O 世界地图在北部边缘对异族区域及末日审判景象的刻画言说了基督世界的使命和危机,此种绘图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坚定基督徒对实现异教徒皈依的一种决心;另一方面,赫斯勒版《启示录》又通过包括上述三幅插画在内、极富创见的多重手段描述了在北方东征中条顿骑士团对“哥革与玛格”的异族征服以及圣母加冕等内容,也一脉传承对基督教使命和危机做出回应。此处,T-O 地图和写本插画所共同展现出的骑士“离心”轨迹显然意指和再生了一种“价值观和权力意志”。

总之,“总引”骑士挺进圣地中心继而奔赴异族边缘的两段“向心”和“离心”轨迹表明,他先自英格兰出发,率先来到伊比利亚半岛参加阿尔赫西拉斯攻城战;随即又在北非为打通“西班牙通道”而战;之后跨越地中海驰骋东岸为收复圣地作战;其后再赶赴立陶宛俄罗斯征战异教区域;最后自异教区返回英格兰同众香客会合相约朝圣。于是依托“加泰罗尼亚地图册”^③,骑士的整个闭环行程随即便在图上划出一圈环绕基督世界的圆形轨迹(参见图 1);环行圆周,本研究再进一步定位骑士各作战地点时发现,一个由东(埃及、叙利亚与土耳其)—西(格拉纳达与摩洛哥)—南(特莱姆森)—北(立陶宛与俄罗斯)四点相连所构成的十字形符号跃然圆内,仿佛欧洲中世纪绘画与雕塑作品中



图1 “加泰罗尼亚地图册”(1375年)中骑士的圆形东征轨迹

经常出现的基督头部背后的一个“十字架光环”，以此象征基督信徒通过受难而获取救赎并沐浴上帝之荣光^②。再回归骑士，解经学认为其所参加的“十字军东征”正是通过“背负十字架”“牺牲自我”(sacrifice themselves)来“效仿基督”(imitatio Christi)的救赎之战。并且，在早期基督教文学中，十字架的四格原本就具有普天下四方得救赎之含义，这同样也与骑士为收复圣地征服异教区而作战四方、以期获取救赎的精神追求相契合^③。同时，光环的圆形轨迹也恰与“赫里福德地图”中“王座基督”将要审判的下方圆形世界相符，从而这一行迹或可被进一步解读为骑士追随上帝旨意、环行基督世界之历程，彰显出一种“影响外部世界的新动力”，最终传递至众香客乃至读者心中一种基督价值观。

四、结语

值得强调的是，文学地理学明确的研究内容和范式为本研究深入解读乔叟及作品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本研究一方面以史籍为基础和参照，考察了乔叟笔下骑士征战经历的历史真实性和文学虚构性；另一方面又依托中世纪地图和插画，复原出骑士相继挺近圣地中心、奔赴异域边缘所形成的环绕基督世界的圆形轨迹，同时又浮现出一个中世纪艺术作品中常见的“十字架光环”，进一步映射出骑士追随上帝以期恩泽的赤胆忠心以及诗人的艺术匠心。

历史上，爱德华三世和其长子伍德斯塔克的爱德华在“英法百年战争”中，为激发和储备战力来对抗同为基督徒的法国人，刻意通过强化“骑士精神”中的世俗和政治因素，以使英格兰骑士群体不惜违背信仰、甘愿沦为战争和王室的服务工具。而同时代的乔叟却逆其道而行，将骑士塑造为始终遵循基督教教义，“为维护基督教信仰而战”(GP 62)，坚守骑士精神本质的形象。某种程度上，诗人的文学努力似乎可视为对欧洲骑士传统荣誉的一种尊重和捍卫，历久弥新。

注释：

- ① 有关苏贾“第三空间”的概念，可参见：Edward Soja.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 and Imagined Places*. Oxford: Blackwell, 1996: 56-57.
- ② T-O 型地图系在中世纪最为常见的一种世界地图(Mappamundi)，以上东下西定位。其中 O 是指环绕圆形世界的海洋，字母 T 中左、右、下的分支分别代表圆形世界内的三大水系：顿河、尼罗河与地中海，它们在圆内将世界一分为三。T 上端横线分割出的上半圆代表亚洲，占据东方位置，下方被竖线分割的左右四分之一圆分别代表欧洲与非洲。
- ③ 本文所参考的乔叟诗文均出自 Larry Dean Benson. *The Riverside Chauc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中文译文主要引用自方重的译本(《坎特伯雷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并在此基础上稍有调整。下文乔诗的中文翻译如无特殊说明，均出自方重译本；本文所有骑士东征地名的古今对应表现主要参考了以下研究：Stephen H. Rigby. *Historians on Chaucer: The “General Prologue” to the Canterbury Tal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2-63；John H. Pratt. “Was Chaucer’s Knight Really a Mercenary?”, *The Chaucer Review*, 22.1 (1987): 8-27；Peter W. Edbury. *The Kingdom of Cyprus and the Crusades, 1191-137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163；John H. Pratt. *Chaucer and War*.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0: 122-124, 165-167. 下文再出现其他地名时将不再做注释；另外，相关研究认为中世纪的“基督世界”涵盖欧洲西部的拉丁基督世界与东部的希腊基督世界。本文根据骑士的征战疆域而将此“基督世界”定义为西部拉丁基督世界。学者弗兰斯(France)认为十四世纪的拉丁基督世界西起西班牙东至意大利以及地中海东岸的塞浦路斯岛，北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与条顿骑士团所在的波罗的海沿岸区域。由此可见，乔诗中骑士的东征轨迹同拉丁基督世界的边缘基本重合。参见 John France. *The Crusades and the Expansion of Catholic*

Christendom, 1000—1714. Oxfordshire: Routeledge, 2005: 251–286.

- ④ 1125年,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主教迪亚戈·盖尔米雷斯(Diego Gelmírez, 公元1120—1140年在位)曾号召信徒开辟前往圣地的“西班牙通道”, 这是本研究发现的有关该通道的最早历史记录。详情参见 Patrick J. O'Banion. “What Has Iberia to do with Jerusalem? Crusade and the Spanish Route to the Holy Lan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34.4 (2008): 383–395.
- ⑤ 相关史料文献来源参见注释③。
- ⑥ 比如1361年, 彼得一世国王率军攻取阿德里亚城, 且分别于1361、1362和1370年多次成功击退土耳其军队的反攻。参见 Peter Edbury. *The Kingdom*. 1991: 163; 1365年, 东征军虽在攻占亚历山大里亚三日后就弃城而逃, 但是基督世界仍视此次军事行动为“上帝给圣徒的一次胜利”。参见 John H. Pratt. “Was Chaucer's Knight Really a Mercenary?”, 1987: 12. 1367年, 塞浦路斯东征军轻松占领列亚斯城。参见 John H. Pratt. *Chaucer and War*. 2000: 165–167.
- ⑦ 本森(Benson)将 GP59 行的“Grete See”解释为“Mediterranean”(地中海及地中海沿岸), 方重也直接将其译作“地中海”。但在与乔叟同时期的《曼德维尔游记》中, “Great Sea”也多次出现且均指代“地中海东岸”。本文结合骑士在埃及土耳其海域的东征海战经历也将“Grete See”确定为“地中海东岸”。详情参见 John Mandeville. *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15: 97.
- ⑧ 法国骑士菲利普·德·梅济耶斯作为彼得国王的辅政大臣是圣地东征的狂热支持者, 他曾跟随彼得一世参加亚历山大里亚之战, 并在其传记性作品《圣彼得·汤马斯》中曾谈及彼得国王此次东征的意图。详情参见 Philip of Mézières. *The Life of St Peter Thomas*. edited by J. Smet. Rome: Institutum Carmelitanum, 1954.
- ⑨ 现代学者普拉特认为骑士有可能在塞浦路斯东征中由于没有获得足够报酬维护马匹与装备而不得不在异族, 似乎也无不妥。参见 John H. Pratt. “Was Chaucer's Knight Really a Mercenary?”, 1987: 18.
- ⑩ 研究表明在十四世纪后半期, 条顿骑士团与立陶宛异族间的战争明显增多。参见 Zigmantas Kiaupa. *The History of Lithuania before 1795*. Vilnius: Lithuanian Institute of History, 2000: 102; Stephen Christopher Rowell. *Lithuania Ascending: a Pagan Empire Within East-central Europe, 1295—13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43.
- ⑪ “Ruce”一词出现于《坎特伯雷故事》的 Hengwrt、Ellesmere、Corpus Christi、Petworth 和 Lansdowne 等诸多早期写本中; 在现代权威刊本 *The Riverside Chaucer*(1987)中, 本森(Benson)将“Ruce”解读为“Russia”, 方重的中译本亦将其直接翻译为“俄罗斯”。
- ⑫ 关于“总引”写作时间的具体考证可参见 *The Riverside Chaucer*. 1987: XXV.
- ⑬ 里加城建立于1201年, 是利沃尼亚重镇, 属其基督教辖区, 也是条顿骑士团在进攻利沃尼亚异教辖区和立陶宛等异教区的东征据点。该城于十三世纪成为波罗的海东岸的贸易中心。参见 Kevin C. O'Connor. *The House of Hemp and Butter: A History of Old Rig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17, 42–44, 53.
- ⑭ 十三至十四世纪的相关史料也显示出波罗的海地区基督徒与俄罗斯人间的长期敌对关系。参见 Anti Selart. “Confessional Conflict and Political Cooperation: Livonia and Russia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in *Crusade and Conversion on the Baltic Frontier 1150—1500*. edited by Alan V. Murray. Ashgate, 2017: 151–176.
- ⑮ 乔叟在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曾担任过外交使臣和伦敦海关官员等职, 并从1360年与1374年起先后分别接受过20马克终身年金和每日一罐酒的赏赐。参见肖明翰:《英语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 第52–53, 61–62, 57, 108页。
- ⑯ 本文引用的《圣经》译文均采用基督新教“和合本”修订版《圣经》, 香港圣经公会, 2010年版。
- ⑰ “赫里福德地图”中两句诺曼法语原文分别为“Leuez-si uendrez a ioie pardurable”和“Leuez-si alez au-fu de enfer estable”。
- ⑱ 在失去圣地后, 条顿骑士团不断“宣传”与确立新的使命——征服异教徒; 在此过程中, 骑士团内部产生了大量修会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主要包括圣人生平传记、骑士团编年史和11部《圣经》译文等。关于条顿骑士团在东北欧所遭受的质疑和生存压力参见 Norman Housley. *The Avignon Papacy and the Crusades, 1305—137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266–268.

- ①⑨ 条顿骑士团的历史参见 William L. Urban. *The Teutonic Knights: A Military History*. New York: Greenhill, 2003: 11–13.
- ②⑩ 本文所参考的 Rps 44 III 版与 Rps 64 III 版《启示录》手抄本均收藏于波兰托伦大学图书馆(Biblioteka Uniwersytecka w Toruniu)。Rps 44 III 版参见 <https://kpbc.umk.pl/dlibra/publication/210209/edition/246434/content>. (Accessed 8/4/2023). Rps 64 III 版参见 <https://kpbc.umk.pl/dlibra/publication/23842/edition/32545/content>. (Accessed 8/4/2023).
- ②⑪ 此处“赫里福德地图”中有关俄罗斯和立陶宛区域的内容描述具体参见 Naomi Reed Kline. *Maps of Medieval Thought: The Hereford Paradigm*. New York: Boydell Press, 2003: 150–153.
- ②⑫ “赫里福德地图”中的原文如下: Veici beu fiz mon piz de deinz la quele chare preistes/E les mameleites dont leit de uirgin queistes/Eyez merci de touz si com uos memes deists/Ke moy ont serui kant sauueresse me feistes. 摘选自注释②⑪中 Naomi Reed Kline. *Maps of Medieval Thought*, 2003: 67.
- ②⑬ 本研究此处之所以取用“加泰罗尼亚地图册”, 主要是因为其以上为北, 地理绘制相对科学准确。它一方面加有海图所特有的准确度较高的海岸线, 一方面又保留有大量内陆地理信息, 系融合海图特征的大型过渡性世界地图, 某种程度上也最为接近现代世界地图, 较为符合现代人的读图习惯。详情参见 David Woodward. “Reality, Symbolism, Time, and Space in Medieval World Map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5.4 (1985): 510–521.
- ②⑭ 本研究认为此处通过文本所解读出的“十字架光环”象征着骑士和基督信徒的一种精神追求——通过受难获取救赎并沐浴上帝荣光。有关光环与圆形的象征意义参见 Alva William Steffler. *Symbol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2: 74, 76, 77.
- ②⑮ 解经学相关内容参见 William J. Purkis. *Crusading Spirituality in the Holy Land and Iberia, c.1095—c.1187*. New York: Boydell Press, 2014: 30–59, esp. 31–39, 42; 十字架的这一文学内涵参见 Peter G. Moore. “Cross and Crucifixion in Christian Iconography, A Reply to E. J. Tinsley”, *Religion*, 4.2 (1974): 104–113.

参考文献:

- [1] 李学欣. 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时期作品中的骑士精神探奥[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 211–215.
- [2] BLOOMFIELD M. Chaucer's sense of history[J]. *The Journal of English and Germanic Philology*, 1952, 51(3): 301–313.
- [3] SHARP W. *Literary geography*[M]. London: Pall Mall Publications, 1904.
- [4] WOOLF V. *Books and portraits: Some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literary and 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Virginia Woolf*[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Jovanovitch, 1977.
- [5] 方英. 论罗伯特·塔利的文学空间研究[J]. 文艺理论研究, 2021(5): 58–66.
- [6] 高方, 路斯琪. 从文本到世界: 一种方法论的探索——贝尔唐·韦斯特法尔《地理批评: 真实、虚构、空间》评介[J]. 文艺理论研究, 2020(4): 21–28.
- [7] 王影君. 论文学空间批评的美学源流[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5): 190–196.
- [8] 杨义. 重绘中国文学的历史地图[J]. 文史哲, 2015(3): 5–21.
- [9] MORETTI F. *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M]. New York: Verso, 1998.
- [10] 梅新林, 葛永海. *文学地理学原理*[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11] HERTZ J. *Chapters toward a study of Chaucer's knowledge of geography*[D]. Dissertation of Ph. D. Lehigh University, 1958.
- [12] MAGOUN F. *A Chaucer gazettee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 [13] WESTREM S. *Geography and travel* [C]//Peter Brown. *A Companion to Chaucer*. Oxford: Blackwell, 2002.
- [14] LAVEZZO K. *Angels on the edge of the world: Geography, literature, and English community, 1000—1534*[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5] KAO W C. *Memorialization in white: Chaucerian topology and the default of subjectivity*[J]. *Postmedieval: A journal of Medieval Cultural Studies*, 2013, 4(3): 352–363.
- [16] BEAL J. Mapping desire in Chaucer's “To Rosemounde,” Shakespeare's “Rape of Lucrece,” and Donne's “A Valediction: Of Weeping” [J]. *Peregrinations: Journal of Medieval Art and Architecture*, 2018, 6(3): 105–129.
- [17] PRATT J. Was Chaucer's knight really a mercenary? [J]. *The Chaucer Review*, 1987, 22(1): 8–27.
- [18] JONES T. *Chaucer's knight: The portrait of a medieval mercenary*[M]. Louisian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19] BEATTIE P. Ramon Llull's crusade treatises [C]//Amy M. Austin & Mark D. Johnston. *A Companion to Ramon Llull and Lullism*. Leiden: Brill, 2019.
- [20] LLULL R. Liber de acquisitione Terrae Sanctae[EB/OL]. (2008-02-01) [2023-10-25] <https://archivesetmanuscripts.bnf.fr/pageCollections.html?col=1>.
- [21] O'CALLAGHAN J. *The Gibraltar crusade: Castile and the battle for the Strait*[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4.
- [22] SMITH L. *Expeditions to Prussia and the holy land made by Henry Earl of Derby in the years 1390-1 and 1392-3: Being the accounts kept by his treasurer during two years*[M]. London: Camden Society, 1894.
- [23] URBAN W. When was Chaucer's knight in "ruce"?[J]. *The Chaucer Review*, 1984, 18(4): 347-353.
- [24] CHEKIN L. *Northern eurasia in medieval cartography: Inventory, tex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M]. Turnhout: Brepols, 2006.
- [25] HARLEY J. *The new nature of map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M].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 [26] BYSTED A. *The crusade indulgence: Spiritual rewards and the theology of the crusades, c. 1095-1216*[M]. Leiden: Brill, 2015.
- [27] HOUSLEY N. *Contesting the crusades*[M]. Hobok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 [28] PETRI D D. *Chronica terre Prussie*[M]. edited by Klaus Scholz and Dieter Wojtecki.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4.
- [29] JOSEPHUS F. *The wars of the jews*[EB/OL]. (2009-01-10) [2023-05-10].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850/2850-h/2850-h.htm#link72HCH0007>.
- [30] CERMANOVÁ P. *Gog and Magog: Using concepts of apocalyptic enemies in the Hussite era* [C]//Wolfram Brandes. *Peoples of the Apocalypse: Eschatological Beliefs and Political Scenarios*. Berlin: De Gruyter, 2016.

On the literary and geography of knight narration in the "General Prologue" to *The Canterbury Tales*

SHI Xiaojun, DONG Sa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As early as the Middle Ages, historians like Ranulf Higden and Vincent de Beauvais pointed out that history and geography are two inseparable dimensions of "human affairs", forming a single entity that influences society. The framework and paradigms of Literary Geography—a research field established by both 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seem to be based on this social epistemology, which include the spatial contexts presented in texts on both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levels, and the geographical images and implications that the contexts generat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knight in the "General Prologue" of *The Canterbury Tales*. On the one hand, it relies on relevant medieval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and literary creativity according to Chaucer's depiction of the knight. On the other hand, using the medieval "Catalan Atlas" as a base map, it reconstructs the knight's two-fold crusading itineraries: first, the "centripetal" journey toward the Holy Land, and then, the "centrifugal" expedition to north-eastern Europe. These itineraries form a "Cruciform halo" surrounding Christendom on the map, reflecting the knight's spirituality in serving Christ as a way of salvation. It is in this way that Chaucer's rigor and ingenuity in his literary creation are seen.

Key words: literary geography; medieval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maps; Chaucer; "general prologue" to *The Canterbury Tales*; knight

[编辑: 陈一奔]